

與聞玉梅教授的合影。

(Dr. Howard) 那裡專門研究B型肝炎，現在是聞名國際的病毒學家。她來剛好把我為陳定信院士準備的家具接下來。她也是一年就回去中國了。

上述這些家具，多半是哥頓教授留下來的，所以並不影響我本身家裡的使用。後來聞玉梅教授也走了，有些家具就流入住在紐約的女兒，等她購置了她自己的住所時，這些有的家具又流入住在維吉尼亞州的岫安手中，現在還在用。

俗語說：「無巧不成書」，這句話用在這裡特別管用。六年前宋瑞珍教授從史丹佛大學回台南掌成大醫學院時，初期

曾向我內人訴苦說他擔任成大醫學院院長時，成大只補助了他一筆二十五萬元的家具費，這不敷支出。我立即學了哥頓教授的例子，讓他用了我留在台南的家具，這些家具我也沒掛在心上，全由他處理；這些內人留在台南的家具只是用來布置她在台南購置的公寓所用，它們不像哥頓教授借給我們的舊家具，而是全新的。

瑪麗

大華府地區在一九七〇年代前期聚集了不少華人與醫學、生技有關的人，於是乎由一位陳姓 (William Chen，中文名字已記不起來) 華人醫師倡導，組織了Mid-Atlantic Medical Association，中譯名簡稱醫學會，我也當了它的發起人，而且是第四任的主席。

話說尼克森總統到了大陸後，開啓了美國與大陸的往來，掀起了美國人的大陸熱。因為去大陸的人突然多了起來，美國政府對大陸的公共衛生、寄生蟲病及傳染病毫無概念，必須有一套較完整的數據書以資參考。美國政府於是邀請了華府的醫學會執筆寫一本書，而其中有關傳染病一章的寫

作大任則落在我的肩上。

寫這書的內容要有其來源，這資料在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簡稱國圖館），於是我就在適當的時候前赴圖書館商量此事。圖書館給我裝在塑膠套裡的一個名牌掛在脖子上，有了這個名牌，就可以在這麼大的圖書館裡的任何地方走動，包括地下室的書庫。國圖館有藏書兩百五十萬冊，連台大的《青杏》及當時台灣各醫學院的學生刊物都有。這個圖書館就是後來成為成大顧問的康明斯博士領導，不過我負起這個寫作責任時，康博士還不是館長。

大陸在文革時期有些科學期刊還是發行的，但文革時期與非文革時期刊登的文章，看前面的短文就一目了然，因為在短文摘要（abstract）前都有稱讚毛澤東的幾句話，例如說，文革時期，患有不孕症的病人在治療後懷孕了，這也先把功勞在短文裡歸給毛澤東，使人讀起來忍不住要嘖飯！

話說有一天我看期刊文章看累了，想站起來在大廳走走鬆鬆筋骨，當我在寬敞的大廳裡走動時，有一位年輕貌美的白人小姐走過來，說我很像她曾經認識的一位中國人，我謝謝她的恭維。在閒聊的過程中，我知道她是西岸史丹佛大學的歷史學博士班學生，名叫瑪麗（Mary Brown Bullock），正在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西方醫學的貢獻，她的研究方法之一，是追蹤協和醫學

院畢業生的腳步，查明這些校友們現在佔據何種地位和影響。這方法也涵蓋在台的畢業生，所以她到過台灣，也見過盧致德、張先林等人，但有一些名字還是無法追蹤。她看到我掛著名牌在圖書館內可以到處走動，於是遞給我一個名單，請我幫她，如遇到這些人的作品就抄下他們的職位及負責的工作，因為這名單上有名字但沒有工作職稱。我瞄了一下她遞給我的名單，一口就答應協助她。

我之所以答應她，是因為注意到鍾惠瀾、林飛卿等人的名字及工作場所、工作內容等，也憶起了不少北京協和畢業生的名字，以及協和的歷史。每次這些陌生的名字出現，我都詳細地把它記下來，交給瑪麗，就這樣



Mary Brown Bullock教授。

她完成了博士班的論文。

等她博士班畢業之後，她把博士論文寫成一本書，書名叫《美國的交換計畫》(American Transplant)，是由加州大學印刷公司出版的。我替她校對了關於皮膚寄生蟲病的部分，所以她的謝詞上出現了我的名字。

這是一本頗為完整的美國教育以及西方醫學在中國如何生根的歷史書，裡面有特別開闢一章描述藍安生(John Grant)。藍安生是一位醫學博士，出生於寧波的傳道士家裡，畢業於密西根大學的醫學院，接著執教鞭於約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他在中國時已能操一口流利的寧波話，因此當洛克菲勒基金會徵人到北京協和去擔任客座教授時，藍安生當然雀屏中選。藍安生和其他的協和教師不同，他拒絕住在協和校內的教員宿舍，而與校外的北京一般市民同住，故在描述藍安生的那一章瑪麗的標題是：「無產階級的醫學家：藍安生」。

當瑪麗的書問市後，位在華府麻州大道的一位富翁開了一個慶祝會，在會場中我看到一個年約七旬的老婦人走來走去，等到她注意到我，就走過來問我在哪裡供職、研究什麼課題等等，言外之意，好像她還蠻跟得上時代的樣子。我禁不住問她：「妳是誰？」她這才告訴我她是藍安生夫人，

名叫丹妮絲(Denise Grant)，法國出身，不過她只是藍安生第二任的太太，因而沒到過中國。她以前是一位水準很高的護士，當場我們的友誼馬上開花。

丹妮絲常常作客我們家，每次來我們家裡吃飯都會帶來禮物，有一次，她帶了一雙象牙做的筷子當禮物，那是古董，裝在一個漂亮且精緻、正面上方覆蓋以一層玻璃的盒子裡。她說這是北京協和的學生送給她先生的禮物，因為她用不著，一直放著也不是辦法，所以送給我。

這雙筷子做工很細而美麗，她回去後，正當我上下檢視它時，突然從盒子飄下一張名片，上面有楊文達敬贈幾個字。我知道楊文達是以前的台灣軍醫局局長，後來有一次我在台南機場曾與他同機隔座飛到台北，我將這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他這才又記起在北京協和的那幾年以及藍安生的生平。他是協和的校友，要我借給他《美國的交換計畫》一書，這事遂傳為佳話。

瑪麗後來有飛黃騰達的職業生涯，她擔任過中國董事會的董事、美國中央研究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術交流委員會委員、威爾遜總統基金會執行長、美國喬治亞洲艾格納斯·史考特學院(Agnes Scott College)校長，以及現任的艾摩利(Emory)大學的中國研究講座教授。

與聯邦調查局人員鬥智

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是無孔不入的，他們的手法有時比共產黨的第五縱隊還要厲害，我也領教了一段時期，時在蔣經國訪美於紐約繁華區的觀光飯店 (Plaza Hotel) 受試圖暗殺後不久，這試圖暗殺的台灣人一共有兩人，一名叫黃文雄，另一人叫鄭自才，都住在巴爾的摩城。一九六〇年代因為華府地區台灣人很少，華府和巴城兩邊的台灣人遇到過年過節總是聚在一起，鄭、黃兩人也摻雜其中，我也認識他們。

不久又加上了，個名叫陳平景的人，是在維吉尼亞州的小鎮開餐館的台灣人，據稱他是一個「強烈」的台獨分子。的確，他的來去用神出鬼沒四個字來形容很恰當，陳平景後來不見了，彷彿從美國蒸發而不知其去向。

話說，有一天我接到一個人的來電，要我某月某日某時到華府十四街與紐約大道交接處一家叫「假期咖啡廳」 (Holiday Coffee Shop) 的咖啡店見面，他自我介紹是馬弟遜先生 (Mr. Matison)，是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他把身上穿什麼顏色的西裝，以及屆時會在西裝領子的反面證明其身分等皆

交代得清楚。他的語氣是如此，我猜想他不應是一個騙徒而予拒絕，故我按時前去赴約。

馬弟遜先生穿得就像在電話裡所說，按時出現在他指定的咖啡店，握手寒暄之後，他就翻了右邊西裝的領子，那裡有聯邦調查局調查員的別針在閃爍著，我猜想他這個動作是必要的制式程序。馬弟遜一邊進行見面的制式程序，一邊說他從未離開過美國，但他講一口流利的中國普通話，也看中國的報紙，表示他的語言能力是很強的。他問我去過哪些國家、參加過什麼學術會議、有多少個在東歐諸國 (即共產圈)、有沒有接觸過東歐代表等。

那是初次見面，而上文所描述的也是他問話的內容，就此道別，好像沒什麼重要的事。

但隔了三個月後，馬弟遜來了第二次，這一次問的，就牽涉到我擔任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的事。他透過我的人脈，問一些人的底細，弄得我有一點煩了，於是問他為什麼選我問這些，他答曰：「台灣同鄉會是台獨的外圍組織，聯邦調查局對台獨本身沒有特別的意見，但這外圍組織的成員最近在紐約公眾中使用了槍枝，想暗殺蔣經國，所以台灣同鄉會馬上被考慮是有暴力潛力的組織。你是華府華人的領袖之一，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你調查。」這些話從他們的立場而言是有一番道理的，但無論如何，我決心要把這事打斷，免得馬弟遜先生每隔一些時候就會找我一次麻煩。

這時恰好我被邀參加在葡萄牙首都近郊厄斯多勒(Estoril)舉行的國際干擾素會議，回程在巴黎落腳於位在凱旋門附近的飯店，把要辦的事統統辦完之後，我想到拉法葉(Lafayette)購物中心買個上學用的皮包給長女岫清。我買完東西，坐地下鐵回來，下了地下鐵在月台上走了一段路，正想步出車站往住宿處走時，迎面來了久未見面的陳平景！幾句快速的寒暄會話，知道他離開華府後到巴黎開了一間禮品店，但他倒沒說清楚為什麼要離開美國到法國去，只說他不久後要到戴高樂機場飛往大陸見周恩來等話。我說我也正要到機場，所以在機場再見面後就相別。孰料巴黎機場大得不像話，我倆根本無法相見，就此告別。

回來華府不久，馬弟遜又打電話來相約敘談，地點相同：這次見面，先聊了幾句我認為無關緊要的話後，他突然問我最近有沒有見過陳平景？這使我全身的警戒機制都緊張了起來，因我從沒想到聯邦調查局的跟蹤手法與消息傳遞之厲害程度，馬弟遜這一問使我有昏倒的感覺。因為這個機警性，遇到陳平景的事我只好照實地全盤拖出，而馬弟遜則忙著把我的話一一記下來，當時我內心打斷馬弟遜與我的關係的決心愈形堅定。

我回喬大以後，想起免疫學博士班的學生當中有一個名叫格倫(Glen Wright)的聯邦調查員，

他的研究課題是有關鑑定已經歷時乾燥的血跡是人血或是動物血的方法。我回到我的辦公室以後，馬上請格倫來我辦公室告以始末，請他幫忙。他拍拍胸口說：「這事交給我辦就是。」(I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這麼一說，也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如何做？反正馬弟遜先生從此沒找過我，倒是我在台灣電視上見過陳平景及鄭、黃兩人呢！

我在桃園機場的黑名單可以用我抵達桃園機場國門時的「等一下」說起，「等一下」的歷史對我來說來得很唐突，也是富於戲劇性的一段，而且它開始與華府醫學會有關，是一段很值得紀錄的經歷。

一九〇〇年我擔任第四任的美國華府中華醫學會會長，該會有許多的會員利用我與台灣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的關係，極力想組團回去過一段由適當的台灣單位出面招待，除了機票以外，都不必頭痛的生活。我則耐不住這多數會員的懇求，決定出面前往辦事處與之交涉，以成多數會員之美。結果經過一段折衝之後，竟然事成。

這整件事由衛生署與教育部出面招待，國際線的機票由團員自己負責，此外其他費用一概由上

述兩單位負責報銷。抵台後住在忠孝西路的天成飯店，並在台北舉行一次學術研討會之後，大夥兒會搭乘一部巴士南下參觀當時國內正如火如荼推動的十大建設的重點，等到一大隊人參觀完中船後就結束行程回到台北。我成爲這個團隊的隊長完全是因爲我是該醫學會主席的緣故。

這個團隊的構成成員很複雜，有一些是在美國上生士長的第二代移民的華人，有一些是經常往大陸跑而在大陸有某些成就的人，像當時常到故鄉無錫的高景泰先生是好例子，他的身分自然也使成爲這次行程的頭痛人物，辦理簽證需時特別久。除此之外，團隊中更有些是從台灣出去、在美國落地生根的人。

最後這個團隊終於成行抵台下榻在天成飯店，在台北的行程很忙，整隊人馬進進出出天成飯店也頗爲頻繁，各單位的參觀活動及學術交流排得滿滿的，因此人不在天成的時間很多。上面派了五個人提供我們服務，他們的服務無微不至，譬如說，你只要說一聲口渴了，服務人員一定有人下車去買可口可樂。那時因爲礦泉水沒有那麼普及，可口可樂可以說是解渴的唯一妙品。

有一天，我們人不在天成，內人的弟弟有一包東西想託他姊姊帶到美國的朋友，但我們人正巧不在飯店，於是他就天成的天廳裡走來走去，想擬出一個辦法把這包東西交到他姊姊手上。就在

這時，他碰到天成的電話總機小姐走過大廳，因為兩人有一些面識，自然問他來天成有什麼事？他答以來找姊夫，她立即問他找的姊夫是哪一位？他照實回答是黃崑巖，她聽到後放低聲音告訴他說：「轉告團長黃崑巖，他的房間是滿佈竊聽器的，要小心說話。」這事傳到我耳裡後，我們夫妻之間的談話皆變成低聲竊語或乾脆改用日語，但我知道這是徒然的，情治單位有的是懂得好幾種語言的人才呢！

後來我們的大客車一路南下，參觀了台中港以及其他重要的十大建設。結果有人有感於幾位服務人員不辭辛勞的服務精神，於是提議眾團員每人出五美元，交給我全權代表全體團員，買一適當的紀念品留給各服務人員，聊表感激之意。我於是多了一項為團員服務的事項。

到了台北，向每人收集了五美元，準備去購買禮物，但團員中有從香港來的丁景耀與黎昌仍等利誘我跟他們一起到香港一玩，說是有富人朋友準備一系列的週末參觀活動。我只好把買禮物的事延期到從香港玩完、回到台灣之後再處理。於是我們一夥人往香港玩了一個週末。

在香港玩了一個週末很是開心，但回到桃園國際機場，接受移民局入國檢驗時，承辦的小姐叫我「等一下」，這是返抵國門叫我「等一下」的第一次。這時只見小姐拿我的美國護照往門後面的

房間進去，讓我在窗口空等了約五分鐘，她帶著我的美國護照回來，我問她：「什麼事？」，她回答：「沒事，同名同姓搞錯了！」

我要請問讀者，我的名字會有同名同姓的可能嗎？天底下會有用我這個名字取名的另一位父親嗎？我父親賜給我的名字是四十五劃的「黃崑巖」，是很少見的。

我對此並無太在意，反正我也只等了一下就進了國門，只覺多一點麻煩而已，結果還不是一樣地入境。但後來問題發生在衛生署，我先去仁愛路圓環現已歇業的遠東百貨公司，用大家捐的美元一口氣買了五張禮券，每張是台幣二千四百元。然後我帶著這五張禮券到衛生署找人交送禮券，出來接待我的是楊漢泉先生，我向楊副處長道謝這次的招待，並提出這些禮券，託請他叫給那五位服務人員，他立即問我：「哪裡有五個？」我說：「明明有五位人員服務我們的啊！」他說署裡只派了三位，其他二位可能是安全局派的人員！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是不是安全局也不關我的事，把五份禮券交給楊副處長便拂袖而走。

這三位或五位服務人員之謎、天成飯店的竊聽器，以及桃園機場「等一下」的連續事件非比尋常，並不是單純三個案件的串連，明顯可看出這是一連串情治單位的監視行動，尤其是「等一下」

三個字後來變成了我每次返抵國門時的歡迎詞就可窺一端。

「等一下」這句聽起來無心而且不起眼的三個字，卻是一九八〇年開始每當我返抵國門，在桃園機場聽見的第一句歡迎詞，說這句話的當然是入關查證的年輕人。

我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二年間旅居美國多年。由於我出身於道地的本土家庭，所以對台灣的政治前途自有一番見解與主張，我心裡是覺得台灣人民該自決政治前途的，我也相信再小的國家與隔鄰的大國並非不可並立，問題只在周圍的大國會不會尊重小國的國格而已，所以我同情在海外奮鬥的台獨分子。但我並非政治激進人士，也沒有任何政治野心，所以雖然有上述意識，仍和駐美國大使館諸先生們來往甚篤，直至台美斷交，我駐美使館降格為代表處後，這關係也一直維繫良好，沒有想到這種關係卻成為我回國通關時，一定得「等一下」的濫觴。

——幫忙林宗義教授——

一九七〇年代，現任三二八受難家屬代表的林宗義教授，頗具前瞻性地發起了一項被政府認為

是台獨運動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林宗義教授是國際聞名的精神科學家，當時已由聯合國重要職位退休而執教於加拿大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特別敬仰他（請參照第七十三頁）。我住華盛頓特區多年，而華府是一個世界性的重要政治中心，林教授發起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非得在華府進行活動，否則效果不彰。我充分瞭解這一點，於是他所吩咐的事在當時都一一照辦。這些瑣事，大都不外乎是糾集演講會的聽眾，或遊行的參加人群；我本人則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他發起的這些活動。一九七二年四月某日，林教授曾在華府記者俱樂部大樓的一個房間召開記者招待會，那次我也受邀參加了。當時我駐美大使館有不少攜帶輕便攝影機的人，不斷地攝錄參加記者招待會的人士，我也因此上了鏡頭。

支持林宗義教授發起的運動的過程裡，使我最感深刻的，莫過於為該會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紐約時報》上刊登的宣言，揮了久未拿過的毛筆。當時寫的是「台灣人民自決」這六個字，我自覺頗為滿意。可惜林教授的自決運動經過時間的摧殘與各方的不停打壓，漸漸地無疾而終，後來就音訊全無了。另一方面，這段經歷則使我被政府劃歸為台灣獨立組織裡的一員，無疑地，對我後來上黑名單也有加分作用。

VOICE OF THE CONCERNED TAIWANESE

April 1, 1972

We, the Taiw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semble here in Washington today to protest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of February 27, 1972 and wish to make it known that:

(1) Taiwan (Formosa) has been ruled by many alien masters: the Dutch and the Portuguese, the Manchus, the Imperial Japanese and Chiang Kai-shek. The people of Taiwan reject the possibility of once again becoming pawn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2) 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 Taiwan is, and has been, a separate entity with fifteen million people who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unique and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 Chinese; and

(3) Taiwan belongs to the Taiwanese. We believe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us, only the Taiwanese can and will decide their own destiny. Neither Mao nor Chiang should have any legitimate right in this matter.

Dear friends of the world--
How many more men should die, such as in Northern Ireland?
How much more shall we suffer, such as in Bangladesh?
How much more blood should be shed, such as the massacre of Taiwanese leaders by Chiang's occupation forces in the February 28th Uprising of 1947 in Taiwan?

"No peace can last, or ought to last, which does not recognize and accept the principle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right anywhere exists to hand people about from sovereignty to sovereignty as if they were property."

--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

☐ I would like to ha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

☐ I am enclosing a contribution. Check payable to: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P. O. Box D
Kearny, New Jersey 07032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1972年4月，刊登於《紐約時報》上的宣言。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178

認識艾琳達

提到「黑名單」，那麼就非得順帶一提我與艾琳達(Linda Aringo)相識的經過，因為這件事也是使我登上黑名單的原因之一。

我有一位台大醫學系的同學，當時已是位自行開業的名醫，他的唯一缺點就是拙於語言，尤其是外文，當然這裡指的就是英文。一九七七年有一天，他想雇一、兩位隨身的外國人住進他陽明山的別墅裡，以便二十四小時的學習英文會話，於是請我代為留意找尋。那時我初回國擔任台大醫學院的客座教授，在台灣的人脈、尤其是老外圈子可說極為單薄，唯一的詢問管道是維拉(Thomas Weller)。維拉是一位約翰斯·霍浦金斯大學的研究生，他是我負笈美國時的指導教授的外甥，當時來台寄讀於台大社會系，並蒐集他的論文資料。有一天，我打了個電話，問他是否有意接受這份工作，他以沒有時間婉拒了我的建議。不過他介紹我一位女性友人艾琳達，說她一定幫得上忙，因為她的人脈很廣，而且富正義感，樂於助人。

我起初並不曉得艾琳達是誰，本以為她是義大利或西班牙人，後來才知道艾琳達是愛爾蘭裔的

入黑名單之列

179

美國人，她的父親是駐台美國顧問團的軍官，她本人則正在台灣某大學攻讀台灣的社會學，獨自住在公館的一棟住宅裡。我曾經和她及另外一位外國友人進餐閒聊，發現她會講流利的中文及閩南語，這使我那位想學英文的同學放了心，因為不必爲了談條件比手劃腳。她的社會正義感很強，是一位倔強的民主鬥士。

不久後，我便見到了艾琳達爲我同學找到的老師。有一天深夜，我拜訪了住在陽明山下的另一位台大醫學系同學，他極力主張即刻邀請上述那位同學來聚聚。而那位同學出現時，便爲我們介紹了隨行的古柏格（Goldberg）夫婦。這對年輕的白人夫婦顯然是艾琳達所介紹的。

讀者或許有印象，艾琳達曾與施明德結婚，在其後則發生了高雄美麗島事件。這些背景使艾琳達搖身一變成了不受歡迎的外籍人士，而遭當時的台灣政府驅逐出境。但她從台灣被驅逐回到美國的時候，也是她在旅居美國的台籍異議人士中名望升至最高的一段時候。我因曾與她有前述直接的接觸，瞭解她的本性，雖然我不是激烈而公開的台獨分子，但對艾琳達的處境別有一番感觸。所以艾琳達在美國各地巡迴演講至華府時，我特別到了華府機場歡迎她。當天約有一百位歡迎人士，裡面當然又摻雜著帶攝影機的台灣政府外交人員。

很難想像在這一百位左右的接機者當中，艾琳達竟只認識我一個！當她認出我在人群中時，馬上兩手攤開，口中叫著：「黃醫生！」熱情地跑過來擁抱我。如此一來，我便極其醒目地上了那些拿著照相機的人們的鏡頭，我的名字也就「正式」地成了那些黑冊子（機場的本子真的是黑色的！）裡的名單。相形之下，我們在家裡爲艾琳達開的招待會似乎微不足道了！

諸如此類造成「等一下」的事件其實還很多，但上述兩件是值得一提的大事。

——與情治單位交手——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我帶著探險家的心情，按約到成大訪視，這是當時夏漢民校長的提議。此舉頗類似國外招攬各層級人員時，必須經過的面試程序（interview），與舊時結婚前的相親相似。當然，相親並不是單行道，我被“interview”，但也可以看看成大的現況，例如經費來源的確實度，以及台南地區的社會環境，到底需不需要動用五十、八十億新台幣來蓋座醫學中心？它對該地區的經濟生態會有什麼衝擊？最後還得考慮家人、家務與公事的處理問題，這些都不是非同小可的。

事，它們攸關我一輩子生涯工作跑道的轉換問題，必須嚴肅以待。

此外，「等一下」的故事也在當時繼續發酵不已。我回美國不久後，住在新竹的二哥打了越洋電話告訴我，新竹團管區有人來家裡詢問我返台的動機與緣由。那時的越洋電話很貴，除了婚喪大事之外，我們家並沒有以越洋電話閒聊或交換普通消息的財力。我覺得莫名其妙，新竹團管區兼辦情治事務，一個黑名單人物的行蹤情報，卻要訪問當事人的家人才能得知，未免顯得太笨拙且不專業了。

我當然很生氣，胸中一股怒氣不能扼抑，決定採取兩個行動。一是寫封長信，把上述黑名單的事件以及在機場受到的「接待」，一五一十地告訴夏校長，使他對這件事有所瞭解。而後來的演變，也證明了夏校長對我的堅強支持心意。

我採取的第二個行動較為複雜。五月的某一天，我打了一通電話給台灣駐華府代表處負責安全工作的主管，當時這個職務是由曾涉入江南案、後來擔任安全局局長的汪希苓執掌。汪先生和我本來就面熟，是普通的朋友。因為我相信他知道我的「底細」，並在此事上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決定打電話約他吃飯，好停止那惱人的「等一下」。

會面地點在華府近郊貝塞斯達的銀宮飯店。我直率地告訴他有關「等一下」的始末，包括新竹的家人受團管區探問的種種困擾。汪先生靜靜地聽我講完一切後，簡單地答覆我：「你先不要生氣，我會替你解決這個問題，也滿足成功大學延攬你的苦心，請等我的電話。」

大約一個月過去了，華府已是春末的景色，汪先生果然打了電話過來，又約我在貝塞斯達的銀宮飯店吃飯。一見面，汪先生就開門見山地跟我說：「黃教授，我剛從台北回來，你的事我已經一切辦妥了，請你放心地回台灣去吧，沒事了！」我心裡還是半信半疑，因為我知道要被列上黑名單是經過長時間的考慮與過濾的，一筆勾銷並不容易。但汪先生既然很誠懇地這麼說，我也就相信而接受。那一頓午餐吃得很愉快。

「等一下」的困擾似乎是這麼解決了，但成大醫學中心計畫的執行秘書聘書卻遲遲未到。延遲的原因另有文章，是汪先生的力量所不及的。因為我沒有向他提起，所以他沒想到在那一管道也有下功夫的必要。兩年後，我自付兩年「試用」期限已到，必須做下重要抉擇，夏漢民校長爲了說服我留在成大而透露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我從來不曾爲了任何一個成大的教授去過警備司令部，只有一次是爲了你。」我才明白一九八二年我的聘書延遲，是因警備司令部另有意見，那時的司令

是陳守山將軍。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拎著行李抵達桃園，過關時沒有再聽到「等一下」這個見面詞，我像一把熱呼呼的刀子切奶油棒一樣，順利地入了境。

但黑名單的故事沒有就此結束。我的秘書在幾年以後告訴我，她那時必須負責每月報告我的行蹤一次，以利相關單位全盤掌握我的活動。這每月一次的報告，前後共持續了兩年之久，可見那雙看不見的手還是沒有放我自由，監視的雙眼還是投在我身上。

——最後的「等一下」——

「等一下」後來也衍生出一件趣事。

有一次，我和內人到香港渡週末，回台時改由高雄小港機場入境，而沒有經過桃園機場。那時小港機場的建築設備還很簡陋，入境的旅客排成兩條長列，附近咫尺之地也沒有辦公室，這會累壞入境處官員。最糟糕的是我老遠望去，工作人員正在翻閱豎立在眼前的黑名單，並與每一本護照仔

細對照。當時桃園中正機場的入境手續已經電腦化，但高雄小港機場入境手續的電腦化未能同步，還在用人工翻閱黑名單的老方法。我心想，汪先生雖然輕易地把我的名字從桃園機場的電腦中刪除，但他可能沒想到台灣還有一個高雄小港機場！

果然，輪到我通關時，當班的小姐一翻閱名冊便說：「等一下！」我於是又站在櫃檯前空等。因為當時的小港機場設備較為簡陋，工作人員必須跑到牆角打電話。幾句寒暄之後，我聽到的是：「沒有嗎？我這裡有，你那裡怎麼沒有？」我心裡揣測我的預料是對了。桃園中正機場的名冊在電腦上，我的名字已由汪先生刪除了，但他忘了將老舊的黑名單上我的名字刪除。

這次經驗對我的自尊心傷害很大，我因此和內人說，以後回台灣不在小港落地，寧願由桃園入境，忍受地遠之不便。但她認為這是一件小事，雖然得「等一下」，後來終將順利入境。於是乎第二次到香港我們又決定由小港入境。大排長龍之際我偷偷往前一看，當班人員還是一個個以人工翻看著黑名單。但出乎意料地，輪到我時，出入境人員並未翻閱黑名單即戳了印讓我通過，我心裡也頗覺詫異，說了一聲謝謝就拎著行李走向樓下海關。等我把手袋及托運行李放在檯上準備受檢，無意中向後一瞄，看到剛才讓我無條件入境的男性出入境人員，從樓上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下樓梯，正

在四處張望。我看他如此辛苦，值得同情，就主動走向他，並把名片遞上說：「你在找我嗎？我姓黃，我是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的院長。我一年要出國七、八次，請你不要找我麻煩好不好？」

聽見我這麼堅決的口吻，這位工作人員立刻回身消失，以後再也沒有「等一下」的鬧劇上演了。

我手上現在還保存著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成大當時的主任秘書李茂雄教授為我具保寫下的文件。我對他的好意及信任表示由衷的敬謝。

訪問中國大陸

簡單地說，一九八一年的情勢有其特殊的地方，那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剛近尾聲，紅衛兵想要鬥的、破壞的，都照毛澤東的意思完成了工作，但大陸還是一看就是一片白襯衫、灰褲子的時代。當時的統戰部特別活躍，做得有聲有色，是大陸全力拉攏旅居在美國台灣學者的時代。

所以，一九八一年的年初我接到上海第一醫學院（後改成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現已併入復旦大學，不復單獨存在）肝病毒專家聞玉梅的電話，邀我前赴該校講學一個月。這並非一件稀奇的事，接到這個邀請，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覺得這個全家造訪中國大陸的機會是一生難逢的，故予以接受，約定的時間是當年六月成行。

——不要買禮物——

那時候訪問中國大陸是很少聽到的事，大陸的統戰做得很周到：第一、護照沒有普通的簽證，簽證是一張紙；第二、由中共政府國務院發了一封信，叫我經常帶在身上，上面寫著：「這一位是國賓，所以機場與港口的檢查請從簡」等語，語言都是白話；第三、我在上海第一醫學院期間，與家人住的飯店是上海當時最好的飯店之一——錦江飯店。上海錦江飯店的中庭有一棟別致的一樓房子，是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時與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之地點，所以該飯店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在上海期間招待得無微不至，除了錦江飯店之外，還包括一部車子及司機。第四、訪遊了各地，在中國大陸一個月，我們全家都被帶至上海、浙江杭州、北京、陝西西安等各地參訪；第五、親自招待我們的有外交部、統戰部、衛生部等重要單位。

但每天趣事連連，無法在此一一披露，要另寫一書才能盡述。我爲了表明沒有做無可告人之事，故事先已獲得我們台灣駐美辦事處對我大陸之行有所諒解，只是他們要我蒐集所見所聞，在抵台北後會有安全局姓項之先生找我簡報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的幾天，在天安門旁的北京飯店，我們不意遇到了惠美已闊別了二十五年未見的堂妹，她的夫婿是華人有名的數學家項武義。大家異地重逢，故興致特別高，約好次日一同共進早餐。次日依約碰面，項教授卻拿出一報紙指曰：「你這樣子還敢離開大陸之後往台灣跑嗎？」項教授知道我當時已經經由宋瑞樓教授在台灣安排好，七月二十幾日要在台大演講，現在顯然有新的局勢發展，要我小心。我心想是誰死了呢？一看報紙，是卡內基大學統計學教授陳文成從台大的圖書館墜樓身亡的消息，這使我不禁楞了一下，決定往台灣之事三思而後行。

我依照原來的計畫，惠美與三個女兒早我三天離開大陸回台，我則於三天後，即七月二十一日抵達香港，住進希爾頓飯店。我們事先約好，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整，由惠美從台灣打電話給我，講好如果台灣的局勢不利我回去，就說「禮物不要買了」，如果政治氣氛還可以允許我回去，就說「記得禮物一定要買」，這個暗語一定奏效。

七月二十一日，我住進香港的希爾頓飯店，下午兩點整，電話真的準時鈴響，我拿起話筒，惠美的判斷與我的預料一樣，說「不要買禮物」。這一下子，因爲不再回台，飛往東京之前多了一天無事可做，所以我去逛了澳門一趟。據說項先生在台北到處找我無門，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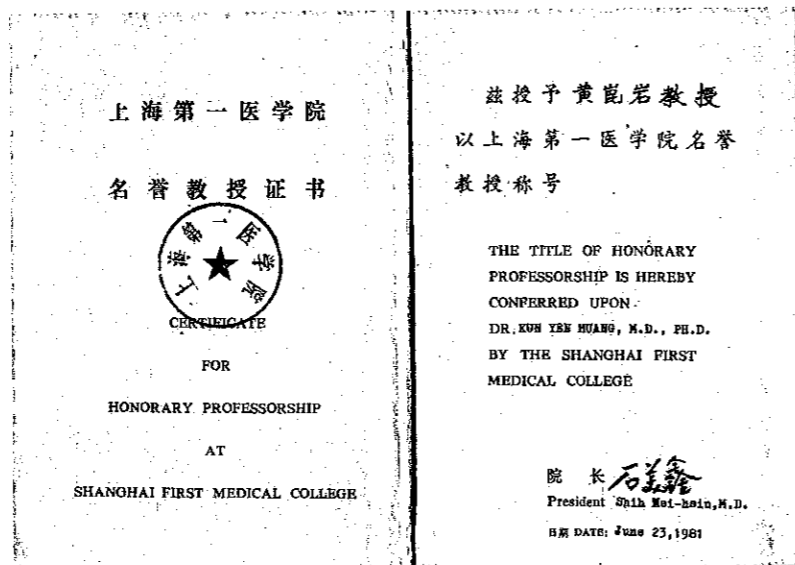
——林飛卿與榮獨山教授——

當時中國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院長叫石美鑫，是一位心臟外科的專家，我和他相處得不錯，有一次還到他家作客呢！但印象最深的是林飛卿與榮獨山兩位教授。

我因為有和瑪麗的軼事在先（請參照第一六三頁），所以對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生的名字特別地熟。台灣曾有一位往北京協和醫學院學醫的人名叫顏春輝，他還當過第一任的衛生署署長，他在協和醫學院畢業後曾與林飛卿教授共同發表過有關傷寒菌的論文。林教授與她夫婿榮獨山都是協和的校友，據說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時都受了不少苦，但詳細事在此不說。林教授在她的微生物科裡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存在，為人極為謙和，我從她身上學了不少做人的秘訣。

榮獨山是一位放射線科醫師，曾經寫了教科書一套，他是個短小而精幹的男人。林、榮兩位教授與我碰面時已經頗老，但榮教授仍喜歡與小孩子混在一起，有一次我們一家人到他們家裡作客，榮教授還一件一件地拿出他收集的古玩與我們的女兒們玩。我當時覺得這些古玩經過了文革時的浩劫未曾消失而仍舊存在，這麼一說，文革打倒孔家店算是只成功了一半。榮教授是西安事變後為蔣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筆者獲上海第一醫學院名譽教授的證書。

介石照大腿部X光片的一位；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從窗口爬出往後山跑，在從窗口爬出去時重重地落地，因而需要醫師的評估。這事從榮教授的口中——道來，特別津津有味。

後來聽聞教授傳來消息，林、榮兩位教授皆已辭世了。

訪問中國大陸